

耻为美国人的泛非洲主义者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30)

杜博依斯博士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巴尔的摩市倡导非洲裔美国人要勇敢地站出来自组工会的非洲裔美国人。他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一位最早期的美国近代民权运动活动家、典型的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作家、杂志编辑和“泛非洲主义者(Pan-Africanist)”。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绝大部分的泛非洲主义者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并没有任何的实质行动，杜博依斯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他对美国白人压迫和歧视黑人的不满与藐视，他在晚年时，不仅拒绝用美国护照旅行，还带着妻子离开美国，定居西非洲黄金海岸迦纳共和国(Republic of Ghana)，更放弃美国公民国籍，归化成为迦纳共和国公民，最终病逝于非洲，埋骨异域，耻为美国人。

虽然就像杜博依斯在临老之际，以93岁之高龄毅然加入共产党一样的充满了争议，但他用实际行动来追求自己的理想，不以成败论英雄，凭着这一点，就足以彰显他鹤立鸡群的书生形象。

杜博依斯的理论和思想，影响着整代的非洲裔美国人，他是美国两位最早期的民权运动的推手之一，也是一位言行一致的美国当代怪杰。杜波依斯于1868年2月23日在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市(Great Barrington)出生。大巴灵顿市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最西南端的一个小城市，全城居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因此他从小就是在白人的社区里长大的，从他的邻居，到他的同学，都是白人，但他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种族歧视。

杜博依斯在大巴灵顿市读书期间，唯一一次因为他的肤色而带来的心理冲击，是来自一位外地的白种女孩子。在球场上，当他要送一张游戏卡给她时，这位充满了种族歧视的白人女孩子不但拒绝了他的好意，还加上了一句使他终生难忘的伤心话：“我不能要你的东西，因为你是个黑鬼！”。

或许言者无心，但是听者有意，这句使杜博依斯伤心透顶的恶话，成为了他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此以后，他才真正的领悟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就是有那么一道看不见但是可以感觉到的难以跨越的鸿沟。

杜博依斯的父亲是阿尔弗雷德·杜博依斯(Alfred Du Bois)，他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是非洲裔法国人奴隶之后，他的母亲玛丽·西尔维亚·布格哈特(Mary Silvia Burghardt)，也是出生在纽约州，是来自西非奴隶之后。

杜博依斯的家族，虽然是出身于非洲裔的奴隶，但却有着一段辉煌的历史。杜博依斯的曾祖父詹姆斯·杜博依斯(James Du Bois)是一位关心政治的医生，不但悬壶济世，还积极参与政治。詹姆斯·杜博依斯曾领导着黑奴们，大力支持英国的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皇帝(King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即历史上简称的乔治皇帝三世。

乔治皇帝三世为了答谢他的功劳，特地赐封了在巴哈马群岛(Bahamas Islands)上一个叫郎琦(Long Cay)的岛屿，予詹姆斯·杜博依斯为食邑。于是他就在郎琦岛上生活了下来，并与他的妻子和女奴们，生下了一大群后裔。

1812年，詹姆斯·杜博依斯带着他的两位心爱的儿子，约翰·杜博依斯(John Du Bois)和亚历山大·杜博依斯(Alexander Du Bois)来到纽约定居，并将他两兄弟送到康乃狄克州接受教育。人生无常，起落难测。正当约翰和亚历山大全心全意地在康乃狄克州读书时，他们的父亲忽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心脏病暴发而死。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们两兄弟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他们向巴哈马群岛的老家求援，结果，消息很快就回来了。不过回来的消息，并不是如何帮助他们两兄弟去完成学业，而是一纸拒绝承认他们为杜博依斯家族分子的公文。

经济来源没了，当然书也读不成了，约翰和亚历山大只得出外工作维生，尝尽了人世间的苦难。亚历山大后来在新英格兰州新天堂市(New Heaven)从商，成为小康之家，并与莎拉·马兹·路易斯(Sarah March Lewis)结婚，生有子女数名。

婚后的亚历山大并不满足于现实的单调生活，为了寻根，他于1830年只身前往海地(Haiti)定居。在那里，他另外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又育有子女数名。数年后，亚历山大又厌倦了那种加勒比海的散闷生活，于是丢下了家人，不告而别，又只身返回美国新英格兰州新天堂市。

杜博依斯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杜博依斯于1833年2月5日，在马萨诸塞州胡萨托尼克市(Housatonic)与他的母亲玛丽·布格哈特结婚，但在他只有两岁时，他的父亲又到别的地方去过新生活了。

杜博依斯自小就与单亲老娘相依为命，他事母至孝，当他母亲因中风而导致半身不遂，无法工作时，杜博依斯义无反顾地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重任，不让他的母亲倒下。靠着亲朋好友的资助，和他自己放学后从事副业的微薄收入，母子二人，仅得温饱，幸免于流浪街头。

杜博依斯年纪虽小，但对一件事情是看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如果要想改进自己和母亲的生活环境的话，那么，通过良好的教育来力争上游，将是唯一的正确出路。锁定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后，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就是在抚养母亲和努力读书这两件事中度过的。

杜博依斯天赋异禀，强记博闻，过目不忘，使师友们多刮目相看。中学毕业前，他就意识到只有良好的教育，才是改进非洲裔美国人环境的最佳方法，因此他不但自我努力不懈，也要求他的同种同学要发奋图强，接受挑战，共创未来。

1888年，杜博依斯以年仅20岁的年龄，就在费思克大学(Fisk University)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为了赚到足够的学费来继续学业，他在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米尼桐卡湖边的“费思克俱乐部(Fisk Glee Club)”，找到了一份收入丰厚的好差事。

杜博依斯在费思克俱乐部里，什么都干，由跑堂到清洁，由厨师到洗碗，非常卖力，深得店主的喜欢和夸奖。“费思克俱乐部”是一家专以美国富豪和欧洲皇族为服务对象的最高档次的娱乐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日散斗金，酒池肉林，荒淫无度，醉生梦死，极尽声色犬马之能事。

杜博依斯每天冷眼旁观，目睹美欧超级富豪们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印证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平的人间现象。他也观察着美欧超级富豪们的言谈举止，交际应酬，和他们衣冠楚楚背后的淫乱和荒唐，这给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印象。

杜博依斯在1888年的秋天，用“哈佛大学”给的250元的奖学金，开始在这家世界闻名的学府里读书，1890年取得学士学位。1892年，他接受了德国“柏林大学”的有薪奖学金，继续深造。在德国读书期间，他有机会周游全欧洲，眼界广开，见识大增。

1895年，杜博依斯成为了哈佛大学有历史以来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这使他寒窗十载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任教于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大学(Wilberforce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大学(Atlanta University)”。

由于杜博依斯主修和教授的都是当代的实用社会学，因此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围绕着“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犯罪”这个主题来研究的。他是美国最早对非洲裔美国人犯罪率有所研究的先锋学者之一，这是一个美国近代社会学的主题，许多学者都在寻求解决之道，但是效果欠佳。

种族性犯罪比率一直是美国治安的主要议题。根据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以凶杀案为例，由1974年至2004年间，在美国全国的20岁至29岁年龄段的罪犯所犯的案件中，52.1%的被告人是黑人，45.9%是白人，2%是其他种族的人；白人谋杀白人的比例是86%，黑人谋杀黑人的比例是94%；1998年，70%的监狱犯是黑人，每三个非洲裔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在坐牢、假释或保释。

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5%，但是关着全世界监犯的25%；2002年在美国，年龄在25至29之间的罪犯，有10.4%的全黑人人口在牢里，而西班牙裔是百分之2.4%，白人是百分之1.2%；2005年，美国全国的犯罪比例，占总人口的13.4%的非洲裔美国人，73.3%的总犯罪率；2006年，美国有700万人是在监牢、假释或保释，其中被关禁的共有250万名。

经过了多年的反复求证与仔细研究，威廉·杜博依斯将这种反常现象归纳为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演变过重紧张压力负荷症(The strain of social revolution)” 。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一旦得到突然而来的自由与解放，一时间无法在这片大地上自我定位，尤其是美国南方的农场刚被解放的黑奴，比之北方的城市黑奴，问题更加严重。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阶级化症(Stratification)” 。这是非洲裔美国人朝着美国主流社会演变中的必然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将随着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口、教育、平等、认同和归属感的逐渐成熟而减少。

第三个原因是：“缺乏才智领袖感化症(The Talented Tenth of exceptional men)” 。在非洲裔美国人的大众化精神领袖出现前，在群龙无首的迷失下，这种现象是可以预期出现的。

被誉为“泛非洲主义之父(The Father of Pan-Africanism)”的杜博依斯，是美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提出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隔离”和“剥夺公权(Political disfranchisement)”两大政策理论依据的创建者。

杜博依斯也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先驱者。1905年，他与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美国人律师弗雷德里克·麦吉(Frederick McGhee)和威廉·门罗·特罗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等非洲裔美国人，共同创建了“尼亚加拉民权运动(Niagara Movement)”。“尼亚加拉民权运动”是美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纲领、有目标和有理想的正规民权组织，它启动了潜伏在非洲裔美国人内心深处的强力的民权平等意识诉求。

在麦吉的身上，可以看见什么是自强不息，什么是人必自敬然后人敬之。他于1861年10月28日在密西西比州阿伯丁市(Aberdeen)出生时，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麦吉(Abraham McGhee)和母亲莎拉·沃克(Sarah Walker)都是来自非洲的美国黑奴。

麦吉的父亲亚伯拉罕·麦吉虽然是位黑奴，但却是一位自我教育成功的黑奴，他没有进过学校，但是通过自修，能写能读，后来还成为了备受社区尊重的基督教教堂牧师。

亚伯拉罕和莎拉生有三个孩子，他们是马修·麦吉(Mathew McGhee)，巴克利·麦吉(Barclay McGhee)和弗雷德里克·麦吉。三个孩子的启蒙读书和基本教育，都是在家里的饭桌上，由亚伯拉罕·麦吉亲自教导出来的。

英雄不怕出身低，豪杰本家是黑奴。麦吉从小就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发誓自我图强，要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就读于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大学(Knoxville College)”，并在1885年取得了法律系学位，因而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批非洲裔美国人律师之一。

麦吉的律师业务是从芝加哥市开始的，但他的成名，却是在带着家人，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St. Paul)定居和执业后发生的。圣保罗市的非洲裔美国人人口并不多，他办理案件的客户，多以美国白人为主。

麦吉精于刑事案件的辩护，很快就使他成为当地的权威辩护律师之一。麦吉同时是“明尼苏达州律师协会”“田纳西州律师协会”和“伊利诺州律师协会”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律师成员，打破该三州律师协会中没有非洲裔美国人律师的零纪录。

由于自己深深体会了美国黑白种族歧视带来的灾难，麦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全体的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和权利的努力。在1905年所成立的“尼亚加拉民权运动”，利用全国性的合法组织，正面地为全体的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宪法权利奋斗的想法，就是来自他的构思。

研究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历史的人，不可能不留意这个划时代的“尼亚加拉民权运动”组织，因为它不但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具有号召力和最具代表性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之前身，它还代表着一种觉悟，一种召唤，一种理想，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全国民权运动的先锋组织。但是这个美国最早期的民权组织因为缺乏有亲和力的魅力领袖和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很快地就寿终正寝，但是它却为美国后来的民权组织，设计了一条坚定而且正确的斗争路线。

1905年7月，杜博依斯、麦吉、特罗特和约翰·郝普(John Hope)等人，在纽约州水牛城的尼亚加拉河对面的加拿大境内，召开了第一次“尼亚加拉民权运动”成立大会。

美国本土的民权运动组织，却要跑到加拿大境内去召开会议，说来也够讽刺的了。本来他们把纽约州水牛城作为开会的场所，但是水牛城几乎全是白人居民，忽然从外地来了一批非洲裔美国人，居然找不到允许他们开会的场所。逼于无奈，只得到尼亚加拉瓜河对面的加拿大地盘，才顺利地将成立大会开成。

“尼亚加拉民权运动”的四位大会发起人邀约了59位嘉宾来参与盛会，但是只有29人出席。“尼亚加拉民权运动”在大会后发表了由杜博依斯执笔写成的《尼亚加拉民权运动宣言(Niagara Movement Declaration)》，其纲领和宗旨为：

第一，反对种族隔离；第二，反对种族歧视；第三，反对剥削有资格出任陪审团的非洲裔美国公民的正当权利；第四，要求民权与自由；第五，要求工作机会的平等；第六，要求住家的平等；第七，要求教育的平等。

“尼亚加拉民权运动”第二次大会，于1906年8月15日在西弗吉尼亚州哈佩斯渡口市施托雷尔大学(Storer College, Harpers Ferry)的礼堂内召开。这是“尼亚加拉瓜民权运动”自190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美国本土所开的大会，特别具有时代意义。

“尼亚加拉民权运动”大会结束后，与会代表们自动自发地，全体步行到了墨菲家族农场(Murphy Farm)园外，向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衣冠冢致敬。大家在墨菲家族农场园外，将鞋子和袜子脱掉，以手提之，赤脚行到布朗墓前，自动排成整齐的队伍，静默沉思，无声哀悼。

布朗是一位为了400万非洲裔美国人黑奴的解放，以实际的武力行动起义，抗议美国奴隶制度，因而得罪了当局，最后被弗吉尼亚州政府以“叛国罪”吊死的民间英雄。布朗并不是非洲裔美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白人。这位使人热血沸腾胸怀激荡的传奇人物，不仅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的源头，也是美国南北战争的

导火索。杜博依斯在事后回忆这次的“尼亚加拉民权运动”第二次大会时，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非洲裔美国人的盛事之一。

1908年，“尼亚加拉民权运动”接受了美国白种女人奥文顿为正式会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也改变了整个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的意识形态。1909年，奥文顿与她的另外几位白人同志，连同仅存的几位“尼亚加拉民权运动”元老，向已经是一盘散沙的“尼亚加拉民权运动”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将其更名为“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重新出发，再踏征途。

如果回顾和检讨一下美国近代的民权运动发展史，就会发现整个二十世纪的头五十年，是被两位出类拔萃的非洲裔美国人所影响和主导的，一位是布克·华盛顿，另外一位就是杜博依斯。

1909年，杜博依斯被邀请到“美国人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发表演讲，这是该会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破例邀请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来演讲，意义重大，此后一直到1940年，才有第二位非洲裔美国人站在他们的讲台上。

杜博依斯同时每周定期地为美国主流报纸如《芝加哥自卫者(Chicago Defender)》《匹兹堡快讯(Pittsburg Courier)》《纽约阿姆斯特丹(New York Amsterdam)》《三藩市历代志(San Francisco Chronicle)》和另外三份非洲裔美国人的报纸写专栏，倡导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

1910年，杜博依斯辞去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大学的教职，全心专注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机关刊物《危机杂志》的发行和编辑业务，杜博依斯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25年之久。

杜博依斯在1910年接手《危机杂志》时，发行量只有一千份，在十年后的1920年，已经高达十万份，杜博依斯也随着他的著作日多和《危机杂志》的发行量而远近闻名。

也许是杜博依斯站得高看得远，也许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也许是天马行空目空一切，他对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诉求，越来越与同志们格格不入，经常引起磨擦。尤其是他与布克·华盛顿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协调。

由于美国当代民权领袖马库斯·贾维尔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并不是没有希望，只是需要力争上游，突破目前二等公民的现状之理论，并不符合杜博依斯的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永远没有希望的悲观主义论调，他就发动了从舆论到演讲包括人身攻击在内说：“毫无疑问地，贾维尔是美国和世界上所有黑人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若不是个癫狂者就是个大叛徒。”

贾维尔也非善类，他毫不客气地加以反攻道：“杜博依斯乃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白人黑鬼，他呀，是一位参合了一点德意志，一点法兰西，一点黑白混血，一点黑鬼而混成的畸形怪物。”最后二人终于彻底地撕破了脸，互相打起丑陋而无聊的口水泥巴战。

杜博依斯的嫉妒心特强，心胸又特别的窄小，眼睛里更容不下沙子。他对于美国舆论界认为布克·华盛顿是“美国当代最有权势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的赞美，显得全身由头发到脚趾的不舒服，三不五时地就将醋意的污水，泼向心胸广阔的布克·华盛顿。

杜博依斯对“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内部的领导人，亦是经常地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极尽无聊之能事。杜博依斯曾讽刺一贯支持他的怀特说：“怀特看起来就像个白人，他的白人朋友，多过黑人朋友，他到纽约时，从不与黑人打交道，他的行为，不得不让人怀疑他还是不是个黑人。”

杜博依斯与任何的民权领袖都难以相处，他认为教育是一种号召与响应，布克·华盛顿则认为教育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杜博依斯认为所有非洲裔美国人应该长期性地、努力不懈地强调和鼓吹非洲人的传统文化和优越性，非洲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根，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骄傲，推动“泛非洲主义”是非洲裔美国人责无旁贷的道义和天职，什么都是非洲的好，非洲在他的眼中，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的代名词。

对杜博依斯来说，美国是没有一点能顺他的心、合他的意的，因为非洲裔美国人，永远会被排斥于美国主流的大门之外，永远无法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无论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如何的努力，必然会以失败的结局收场，因为美国的白人，是不会允许非洲裔美国人在这片大地上与他们平起平坐的。

而布克·华盛顿则认为这样非但不妥，而且不切实际，他坚定不移地主张非洲裔美国人应该远离非洲传统，面对现实，认同美国，逐渐地融进美国主流社会，非洲裔美国人必须要以此为家，以此为国，荣辱与共，同存同亡。允以时日，非洲裔美国人一定能在美国登堂入室，一定可以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因为非洲裔美国人就是美国的传统，就是美国的文化，就是美国永远无法将之切割的一部份。

杜博依斯觉得非洲裔美国人被美国白人种族歧视了，非洲裔美国人应该站出来要个说法，要个交待，为了达到这个战略性的目的，非洲裔美国人应该向美国白人挑战，在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战场上向美国白人挑战。

布克·华盛顿则认为种族歧视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是不公平的，但要消除它，是要靠努力和争取的，但是不能无限上纲，是非不分，将所有的事务，都与种族歧视联系起来，这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是得不偿失，是矫枉过正，是会为非洲裔美国人带来负面的影响和灾难性的后果的。非洲裔美国人要自强不息，要自我教育，要自我升华，脱离客居心态，认同归属美国，唯有如此，非洲裔美国人在这片大地上，才有尊严，才有地位，才有希望，才能成为有权利亦有义务的美国公民。

杜博依斯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有着严重的“双重意识标准(Double Conscious Mind)”，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扮演黑人，什么时候扮演白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耻辱。布克·华盛顿并不赞成，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为例证之，他说自己从来未遭遇过真正的种族歧视，而唯一一次具有侮辱性的种族歧视，是发生在近年来的一次偶然事件。

布克·华盛顿认为树上有了一只坏苹果，并不能就否定整棵苹果树的价值。其实，这种思想上的差异，老早就已经存在了。1905年在加拿大境内的“尼亚加拉民权运动”，大家就是以布克·华盛顿为他们的思想标准和行为模式的最佳典范。

但是当布克·华盛顿发现尼亚加拉民权运动成员们言行不一的时候，他立即公开宣布撤销他对“尼亚加拉民权运动”的支持，这个决定导致了“尼亚加拉民权运动”的瘫痪和解体。

布克·华盛顿并不是唯一不赞同杜博依斯激进思想和自以为是的非洲裔美国人领袖。“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秘书长怀特，和后来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领袖威金斯等，都因为无法接受杜博依斯的偏激思想和鼓吹复辟而与之保持距离，逐渐疏远之。

1934年，杜博依斯变本加厉，居然在《危机杂志》的专栏里，一连发表两篇文章，公然公开大声疾呼，非洲裔美国人应该要与美国白人彻底地分离隔绝，因为这才是正确而有效的政治政策。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最高领导和高级干部们，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已经逐渐制度化和正规化地为全美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权权利之际，再也无法容忍杜博依斯的蛮干和煽动，坚决地与之摊牌。

摊牌的结果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与其意见不和，整日的虚与委蛇，倒不如一拍两散，各奔前程。杜博依斯觉得既然改变不了“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只有改变自己，他毅然提出辞职，带着失望和悲凉，离开了亲手耕耘了25年的《危机杂志》，返回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大学”教书。

其实从1920年开始，杜博依斯的思想就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开始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甚至于美国人民，由失望到绝望，他对于不同的意见和反对自己的声音，越来越无法接受和容忍，甚至因为微小的差异，就要恶言恶语地以背向之。

杜博依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德国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和苏联的共产党的兴起和强大，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这几个反民主自由体制最凶猛的暴力集团，正符合了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反美意识形态。

1936年他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特务疋田安一(Hikida Yasuichi)的煽动和洗脑，居然相信了这个日本特务的连篇累牍的谎言和谣言，双方不谋而合，自此深信不疑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甚至于心甘情愿地为疋田安一在美国鸣锣开道，干上了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国第五纵队的急先锋。

疋田安一顺着杆子往上爬，诱惑着杜博依斯到日本和中国去访问。在日本，杜博依斯受到了日本特务们刻意的热情招待，尤其是一直鼓吹人类要多种族性开放的杜博依斯，在日本美女们的刻意迎合和“交流”下，日以继夜加倍地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起来，升华到了他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神仙境界。

当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后，杜博依斯的兴奋度比之日本人还要厉害，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连连在他的文章里，击节赞叹，美誉之为“有色人种的骄傲”。

杜博依斯又从日本军国主义特务刻意为投其所好而特别安排的温柔乡里，来到了百废待兴的中国，他的东赢情愫和兴奋之情，意犹未尽，他热情地告诉中国人民说，你们要欢迎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因为他们不是强盗和暴徒，他们是些“尚武精神的武士”，是好人，是人类自由的真正解放者。

中国人的脑袋瓜，并没有像杜博依斯那样子的灌了水，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连篇鬼话了。相信日本军国主义？请去问问中国人、韩国人和东南亚那些被他们侵略过的诸国人民，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1936年，杜博依斯又在纳粹德国，看到了表面的强大和耀眼的繁华，他好像看到了自己梦中的天堂。他在德国受到了纳粹学术界无与伦比的尊重与肯定，这些在美国永远无法得到的肯定和待遇，使他受宠若惊，使他神魂颠倒，使他更加的自我陶醉。

杜博依斯亲眼看到了德国的经济，他返回美国后，写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这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徒们器重、依赖和爱护犹太人的直接结果”。杜博依斯更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唯一的正确出路和希望。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揭秘的资料显示，早在1942年5月时，杜博依斯就已经在他自己的文章里承认，他已经是一位“社会主义者(Socialist)”了。1953年，他在《国家监护杂志(National Guardian)》上发表文章，赞美他心目中的偶像斯大林说：“斯大林是当代的伟人，在二十世纪里，仅有数人能接近他那种地位。”

1959年，共产国际为了支持和拉拢住这位美国黑人“同志”，特地颁发了当年的“列宁和平奖(Lenin Peace Prize)”给一贯讨厌和平的杜博依斯，这更使他感激涕零和兴奋不已。1961年，为了要和“美国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和表明要对着干到底的决心，他以93岁之高龄，突然公开宣布正式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偿“革命”宿愿。

1963年，正当全中国人民忙着“高举三面红旗”之际，怀着朝圣的心态，杜博依斯又来到了“红色中国”。全国“革命”的气息，使他又得到了另一层次的觉悟，他忽然发现，原来中国共产党比日本的军国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更好，更管用，于是自此以后，他终于“得道”了。

成为了共产党人后，杜博依斯再也无法继续住在“帝国主义”而且“充满了罪恶”的美国，借着西非洲黄金海岸迦纳共和国夸梅·恩克鲁玛总统(President Kwame Nkrumah)的邀请，藉着前往协助由迦纳共和国政府主持的《大非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fricana)》的编辑工作机会，他带着妻子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前往迦纳共和国定居。

杜博依斯为了显示他对美国的讨厌和藐视，他拒绝使用美国护照作为他到迦纳共和国的旅行文件。1963年，杜博依斯不但拒绝延期他即将到期的美国护照，还放弃了他的美国国籍。

杜博依斯在想起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堕落”，“美国帝国主义”的可恶，美国政府对他叛国的起诉等，顿觉羞为美国人，于是与他妻子两人，同时毅然宣誓归化成为迦纳共和国公民。从1962年开始，杜博依斯的健康开始恶化，使他再也难以完成《大非洲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只得赋闲在家养病。

1963年8月27日，在金恩的华盛顿百万人和平大游行，和他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的前一天，杜博依斯病逝于迦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市(Accra)，享年95岁。

在金恩牧师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讲前，“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领袖威尔金斯当众宣布了杜博依斯在西非过世的消息，25万人同时静默一分钟，向这位备受争议的民权老前辈致敬。

杜博依斯一生出版了37本书，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可谓著作等身，虽然争议不断，虽然是非不明，虽然误入歧途，但是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萌芽阶段，他扮演了一个指路明灯与开路先锋的角色，在早期鼓励非洲裔美国人奋斗的道路上，其功不可没。

1992年，美国邮政局发行了一枚杜博依斯肖像的邮票，作为纪念他对美国近代民权运动贡献的肯定。1994年10月，“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图书馆，以“威廉·杜博依斯”命名之。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宿舍，也以“威廉·杜博依斯”命名之，用以纪念他在这里完成他的代表作《费城的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待续)

2011年4月24日 高胜寒 在美国华府